

上海方言的形成及其特點*

陳忠敏

[提要] 本文從語言接觸的角度和方言形成的歷史人文背景來分析上海市方言的各種變異及其原因。全文分五部分：（一）上海地區方言分佈概況；（二）市中心方言區其他主要特點；（三）市中心方言區形成的歷史人文背景；（四）市中心方言區170年來的演變；（五）結語。

[關鍵詞] 上海市區方言 聲調 語言變異 語言接觸

[中圖分類號] H0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2013)04 - 0188 - 10

一、上海地區方言分佈概況

上海市包括上海市中心區及原屬郊縣的寶山區（原寶山縣）、嘉定區（原嘉定縣）、青浦區（原青浦縣）、金山區（原金山縣）、奉賢區（原奉賢縣）、閔行區（原上海縣）、浦東新區（原屬川沙縣、南匯縣）和崇明縣等地。據2013年統計，上海市常住人口2,371萬，戶籍人口1,421萬，整個上海地區的面積有6,185.72平方公里。

上海話，俗稱“上海閒話”，屬吳語太湖片蘇（蘇州）滬（上海）嘉（嘉興）小片方言。如此眾多的人生活在這樣有一定範圍的空間，所說的話自然是有差異的。根據作者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的調查研究，上海地區的方言可根據聲調的調類分合及調值特點分為五個區：市中心方言區、崇明方言區、嘉定方言區、松江方言區和練塘方言區。市中心方言區指上海市中心區範圍內的上海話。

上述方言分區是按方言的聲調特徵，即古調類在今方言裡的分合情況作為標準來劃分，表1按古聲調四聲八調類及聲母的清、次清、濁等情況排比五個方言區聲調的調類和調值。崇明方言區以崇明縣縣治城橋鎮話作代表，嘉定方言區以嘉定區政府所在地嘉定鎮話為代表，練塘方言區以青浦區練塘鎮話作代表，松江方言區以松江區政府所在地松江鎮話為代表，市中心方言區老派、多數派聲調差異明顯，所以就同時列老派、多數派聲調。

*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漢語方言自然口語變異有聲數據庫建設”（項目號12&ZD177）及復旦大學“985工程”三期整體推進人文學科研究項目“吳閩語語音層次研究”（項目號2011RWXKZD027）的階段性成果。

從調類數來看，最多的是九個調，如練塘鎮話陰上次清聲調和全清不同類；最少的是市區話中派，調類只有五個，古陰上、陰去同調，古陽平、陽上、陽去同調。從調值來看，崇明方言區跟其他方言區的差異最大，除陰平、陰入、陽入相同外，其他調類的調值都不對應。練塘方言區、松江方言區、市區方言區、嘉定方言區聲調的差異比較小。特別是練塘方言區、松江方言區、市中心方言區聲調歸併的途徑是一脈相承的。從練塘方言區到松江方言區到市中心方言區可以看出聲調合併、簡化的脈絡：9類聲調（練塘）先是次清上聲調跟全清上聲調合併，就相當於松江方言區的8個調，然後陽上跟陽去合併，成為7個調（如松江方言區的辛莊、青浦鎮），再其次是舒聲陽調類合併為一類，為6個調（如市中心方言區的老派），最後是陰上和陽上合併，成為5個調類，就是市中心方言區的多數派。

練塘方言區聲調是9到8類，8類的事古次清陰上調同如陰去調，如青浦的商榻、金澤等地。松江方言區聲調是8到7類，7類的有兩種情況：（1）古陽上、陽去同調，如青浦區的青浦鎮話、閔行區的莘莊鎮話等。（2）古陽平、陽上不分，同調，如浦東新區的惠南鎮話、川沙鎮話。

表1

	陰調類					陽調類			
	平	全清上	次清上	去	入	平	上	去	入
崇明方言區	53	335		44	<u>55</u>	13	31	213	<u>12</u>
嘉定方言區	53	34			<u>55</u>	31			<u>12</u>
練塘方言區	53	512	44	35	<u>55</u>	31	22	13	<u>12</u>
松江方言區	53	44		35	<u>55</u>	31	22	13	<u>12</u>
市中心方言區	老	53	44		35	<u>55</u>	13		<u>12</u>
	多	53	34		<u>55</u>	13		<u>12</u>	

五個方言區中松江方言區的範圍最大，根據聲調的分合特點及調值特徵還可以細分為三小區：（1）松江方言小區；（2）浦東方言小區；（3）上海（原上海縣）方言小區。三個方言小區的聲調特徵見表2：

表2

松江方言小區聲調有8至7類，如果是7類的，是古陽上陽去合併，調值為13調，所以松江小區與其他兩個小區的最重要的聲調區別陽平為低降31調，上海方言小區最大的特點是陽平是低平調，浦東小區跟其他兩個方言小區的區別是古陽平陽上合併。

	陰調類				陽調類			
	平	上	去	入	平	上	去	入
松江方言小區	53	44	35	<u>55</u>	31	22	13	<u>12</u>
上海方言小區	53	44	35	<u>55</u>	22	13		<u>12</u>
浦東方言小區	53	44	35	<u>55</u>	113		13	<u>12</u>

二、市中心方言區其他主要特點

市中心方言區一個重要特點是老派和多數派有較大的差異，其中老派的語言特點接近周圍的松江方言區上海方言小區。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老派讀音逐漸消失，多數派已經作為市中心方言區的主流。老派與多數派有如下的差異：

老派與多數派最為重要的差異是聲調系統的差異，老派有六個聲調，多數派是五個聲調（見表1）。老派陰上陰去分列，多數派則兩者合併。

老派和多數派的連讀變調規律不同，老派連讀變調規律複雜，多數派連讀變調規律是整個吳

語區最為簡單的。以兩字組為例，多數派的變調模式跟首字的調型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整個兩字組變調就是首字聲調的調型向第二個音節延伸，第二字的聲調不起作用。老派的變調規律複雜，變調模式同時受首字和第二字調型的制約。

古非（敷）奉微母和曉匣母合口字聲母在老派分別相同的，非（敷）母和曉讀雙唇清擦音 Φ ，奉微母和匣母則讀雙唇濁擦音 β 。多數派則不同，非（敷）母讀 f ，曉母讀 h ；奉微母讀 v ，匣母讀 h ：

	府	火	分	昏	飯	還	文	渾
老派	Φu^3		$\Phi \eta^1$		$\beta \epsilon^6$		$\beta \eta^6$	
多數派	$fu^5 \neq hu^5$		$f\eta^1 \neq hu\eta^1$		$v\epsilon^6 \neq h\upsilon\epsilon^6$		$v\eta^6 \neq hu\eta^6$	

老派區分尖團音，即精組聲母和見組聲母在細音前聲母不同音，多數派則沒有區別，精組聲母和見組聲母在細音前聲母同音。如：

	酒	九	青	輕	息	歇
老派	$tsi\gamma^3 \neq t\epsilon i\gamma^3$		$ts^h i\eta^1 \neq t\epsilon^h i\eta^1$		$si\eta^7 \neq \epsilon i\eta^7$	
多數派	$t\epsilon i\gamma^5$		$t\epsilon^h i\eta^1$		$\epsilon i\eta^7$	

端組聲母後哈韻和寒韻字韻母讀音在老派是不同的，多數派則相同。如：

	來	蘭	才	殘
老派	$le^6 \neq l\epsilon^6$		$ze^6 \neq z\epsilon^6$	
多數派	$l\epsilon^6$		$z\epsilon^6$	

知照組聲母後遇攝三等字韻母老派讀 υ ，多數派讀 η 。如：

	主	處	書	除
老派	$ts\upsilon^3$	$ts^h \upsilon^3$	$s\upsilon^1$	$z\upsilon^6$
多數派	$ts\eta^5$	$ts^h \eta^5$	$s\eta^1$	$z\eta^6$

第一人稱複數代詞，多數派是“阿拉” $A\eta^7 lA^1$ ，老派則是“我侬” $\eta u^6 \eta i^6$ “侬” ηi^6 。

“勒啦”和“勒海”原來分別表示近指和遠指，放在動詞前表示動作的進行，放在動詞的後面則表示動作或狀態的持續。老派多用“勒啦”，跟松江方言區相同，多數派多用“勒海”跟松江方言區不同。如：老派說“儂勒啦做啥？（你在做什麼？）；我坐勒啦。（我坐著）”。多數派則用“儂勒海做啥？（你在做什麼？）；我坐勒海。（我坐著）”來表達。

三、市中心方言區形成的歷史人文背景

市中心方言區所屬範圍東南西北四面受松江方言區包圍，其中西南北三面與松江方言區上海方言小區所屬範圍接壤，東面則沿著黃浦江與松江方言區浦東方言小區所屬範圍毗鄰。

市中心方言區的所屬範圍原屬上海縣的一部分。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華亭縣升格為松江府，並在吳淞江與黃浦江的交接地帶設立上海縣，上海縣的縣治就在今上海市中心原南市區一帶（今屬黃浦區），隸屬松江府，這是上海建縣的開始。明永樂年間（15世紀初），為了解決吳淞江長期淤積、通航不暢的問題，政府主持進行了一項稱為“江浦合流”的大型水利工程，即拓寬黃浦江和吳淞江的下游，原來吳淞江的下游成為黃浦江的入海水道，而吳淞江則成為黃浦江的一條支流。從此以後，黃浦江成為這一地區主要的航運通道。1842年中英簽訂《南京條約》，次年，上海成為通商口岸，允許外國僑民前來居住、經商。英、美、法等國相繼在原上海縣城以

北，黃浦江、吳淞江（蘇州河）交界處開闢租界。隨著租界地商業、服務業、文化業、工業的興起，來自全國各地的移民進入市區，市中心的人口密度在短時間內快速增加。在普通話尚未普及的年代裡，大量的、壓倒多數的外地移民及他們的子女為了生存，都學說上海話，用上海話來交際，所以市中心區始終通行上海話。不過，由於上海市中心政治、經濟、文化方面地位的迅速改變，也由於移民的母語在不同程度上起了沖淡本土方言某些特徵的作用，上海市中心話在原松江方言區上海小區的基礎上迅速發生變化，使本屬於吳語瀕海偏遠地區的，發展緩慢的，較蘇州、杭州、寧波、紹興、嘉興等方言古老的舊上海話，在近一百多年內一躍而領先，成為整個吳語方言中發展最快的上海市中心話。

四、市中心方言區170年來的演變

市中心方言的記錄從開埠以來，延綿不斷，最為重要的記錄有：1853年英國傳教士Joseph Edkins 著有*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一書，對當時的上海縣城話有較為準確和詳盡的描寫；1915~1926年出版的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1928年出版的趙元任《現代吳語的研究》一書也有市中心方言區新、舊、混合三派的描寫（只記錄新舊兩派）；1960年出版的《江蘇省和上海市方言概況》和1962年許寶華與湯珍珠的《上海方音的內部差異》對上海市中心方言及其差異以及上海地區的方言有較為細緻的描寫；1988年許寶華、湯珍珠主編的《上海市方言志》則對上世紀八十年代市中心方言作了極為詳盡的描寫；1992年錢乃榮的《當代吳語研究》也有上海市區話的描寫。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有大量的上海地區，包括市中心方言的調查和研究，包括筆者的調查和研究。市中心方言區本屬松江方言區，開埠以後各地移民（移民的來源以上海周圍的江浙兩省為最多）在短時間內紛至沓來湧入市中心區，這些移民所說的上海話沖淡了原上海話的某些特徵，使得市中心方言脫離原松江方言區的演變軌跡，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方言區。排比上海市區從開埠到現在的170年來的語言記錄，以及這些演變跟各時期權威語言、移民語言比較，可以看出市中心方言區由語言接觸所引發的各種演變。下面分析市中心方言區幾項語音及句法特徵來看語言接觸所引起的變化。

（一）聲調的演變

聲調的類別和調值是市區方言有別於其他四個方言區的最為重要的特徵。早期市中心方言的聲調跟周圍松江方言區上海小區方言是十分吻合的，Edkins在*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一書的第一部分“語音”裡，曾花很大篇幅描寫上海話的聲調，從第6頁到43頁都是聲調的描寫。據筆者和其他學者的研究，Edkins對當時上海話（市區）聲調調類的分類和調值的描寫是仔細嚴肅的，也是正確的。我根據他的描寫以及參照市中心方言區周圍的松江方言區上海小區方言作了如下的聲調構擬（英文為Edkins原文描寫），見表3：

表3

陰調類				陽調類			
平	上	去	入	平	上	去	入
upper	upper	upper	upper	lower	lower protracted,	lower	lower
acute	even	quick rising	short	even	rising at its close	quick rising	short
53	44	35	55	22 ³	113	13	12

Edkins在原書第八頁描寫陽平時說：Lower even tone. A low musical sound without deflection. 不過在原書第27~28頁再對陽平具體描寫時說：Lower first tone. This is a long low tone deflected upwards at the end. 所以我構擬為22³。陽上調很不穩定，有一部分陽上字在原書裡標為陽平調，另一部分，主要是全濁陽上，則讀入陽去。從他所舉的比較穩定的例子來看都是次濁上聲字，不穩定的陽上字基本都是全濁聲母字。但是根據筆者仔細核對，發現很多陽上字，不管是全濁還是次濁，還有陽平、陽上的混讀。如：“伴” bèn（第138頁第3行）標為陽平，“米” mî（第104頁倒17行）標為陽平，’mî（第2頁）標為陽上，“秒” miao（第87頁第7行）標為陽平，“懶” lan（第91頁第5行）標為陽平，“水桐” ’water bucket’這個詞他認為是“上聲+平聲”的組合（第20頁倒17行）標為dóng，也就是陽平調。其實這個詞的第二音節是個陽上調，本字也非這個“桐”字，Edkins標寫為陽平調，又用這個“桐”書寫，說明當時某些陽上字和陽平字已經同音了。

筆者認為這反映了當時上海市區話裡有一種陽上和陽平合併的音變。聯繫全濁陽上當時也正向陽去演變的事實，我認為陽上調正處於向陽平、陽去雙向擴散音變。陽上變陽平是本土方言自身的演變，今松江方言區浦東小區正有相同的音變；而陽上變陽去則是外來權威官話對當時市中心方言施加的影響，陽上調受兩種音變的作用，從而產生雙向擴散演變。^①1853年市中心方言陽上極不穩定，一部分歸陽平，一部分歸陽去。這些歸併的類型可以在今周邊的上海小區方言（陽上歸陽去）和浦東小區方言（陽上歸陽平）找到。市中心方言舒聲陽調類合併的原因有兩個：第一，三個陽調類本身的調值非常接近；第二，存在著兩種音變層次：陽上變陽平和陽上歸陽去，使得陽上調出現向陽平、陽去雙向擴散。陽上的雙向擴散對本來已經相當接近的陽平、陽上、陽去調值起了一個類似色彩調和混淆的作用，最後使得市中心方言舒聲陽調類相同，這六類聲調就是市中心方言老派的聲調格局，也是1928年《現代吳語的研究》記錄上海市區話的聲調系統。換句話說，從開埠到上世紀二十年代末，上海話完成了舒聲陽調類合併的語音演變。

從1928年到1960年，市中心方言的聲調又發生了合併，在1960年的調查中，市中心方言多數派的聲調陰上與陰去已合併，調值為34。換句話說，市中心方言區從上世紀二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這三十年間多數人已完成陰上與

表4

		陰調類				陽調類			
		平	上	去	入	平	上	去	入
嘉定方言區	1928年	53	35	44	<u>55</u>	31		13	<u>12</u>
寧波方言		53	35	44	<u>55</u>	24		213	<u>12</u>
市中心方言區	1928年, 今老	53	44	35	<u>55</u>			13	<u>12</u>
	今多	53		34	<u>55</u>			13	<u>12</u>

陰去的合併。如果說市中心區方言老派舒聲陽調類合併為一類仍是松江方言區聲調演變的範圍，因為松江方言區浦東小區、上海小區新派正是如此的聲調格局，那麼市中心方言陰上陰去合併則已經脫離松江方言區聲調發展演變的軌跡。可以說，陰上陰去合併是市中心方言脫離松江方言區成為獨立方言區的一個最為顯著的標記。筆者認為這跟上世紀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移民方言的滲透影響有重要的關係。上世紀二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正是市區人口急劇增長期，市中心方言區陰上陰去合併跟寧波方言及市區北邊的嘉定方言區的影響滲透有關。表4是嘉定方言區1928年、寧波方言及市中心方言區老派、多數派聲調系統對照表。

比較嘉定方言區1928年、寧波方言及市中心方言區聲調，可以看出它們的陰上、陰去的調值

剛好相反，即嘉定1928、寧波陰上是高升調，陰去是高平調，而上海市中心區陰上是高平調，陰去才是高升調。嘉定地區和寧波地區的移民進入上海市區，習得上海市區話時帶上母語陰上、陰去的特徵，由於母語裡陰上陰去的調值跟上海市區的剛好相反，所以這些移民在說陰上字的時候會有時候讀高平調，有時候讀高升調；說陰去字的時候也一樣，有時候會高升調，有時候會高平調，漸漸地陰上、陰去的區別模糊，然後感染其他人，使得市區絕大多數人陰上、陰去混同。換句話說，市中心方言區絕大多數人陰上與陰去合併是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三十年裡完成的。

(二) 咸山攝舒聲韻的演變

比較Edkins 1853年的紀錄、上世紀初高本漢的記音（1915~1926）以及趙元任1928年的紀錄，我們可以看出Edkins1853年所記的輕微鼻化元音韻母已全部變為純口元音韻母。如én[ẽ]、ién[iẽ]、wén[uẽ]分別變為相應的[e]、[ie]、[ue]韻裡，ön[ø]、iön[iø]分別變為相應的[ø]、[iø]。趙元任在當時看出上海市區方言分歧較大，所以在他的《現代吳語的研究》一書裡，特別分為舊派、混合派和新派三派（實際只記舊派和新派），舊派已經發生了變異，跟高本漢的紀錄有所不同，我們比較Edkins 1853年、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1915~1926）和《現代吳語的研究》（1928）的記音，可以看出咸山攝舒聲韻發生了如下的變化。見表5：

比較Edkins和高本漢的，一看就知道是輕微的鼻化丟失，變為純口元音，元音音色沒變。到了趙元任的舊派基本還維持高本漢時期的讀音，不過有的字元音的音色也發生了變化，比如表6裡“蠶”字讀音從原來的ze變為zø。關於這一音變，趙元任《現代吳語的研究》第四章“聲韻調總討論”對上海市區話有個討論：“（上海市區）有新舊派，新派分類近似蘇州，舊派近似浦東，（兩派人以‘蘇州音’、‘浦東音’互相指斥），但是許多人攙雜兩種。舊派來=雷≠蘭，新派雷≠來=蘭。舊派‘on’（暖，南）有的字讀e有的讀ö（即[ø]），新派一律作ö，舊派‘h(u), f’常混（忽=拂），‘w, v’常混（王=房），新派不大混。”

很明顯當時上海話那些字從e變為ø是受蘇州話的音類影響。“南內”、“暗愛”在趙元任（舊）、高本漢記錄裡是分別同音的，

表5

“蠶站”在高本漢記錄裡也是同音的，但是這些字的讀音到了趙元任（新）和今天多數派都分別不同音了，讀-e或讀-ø完全跟蘇州話一致，而不受上海市區話內部的語音條件制約，很顯然這是由於語言接觸所造成的音變。由語言接觸造成的變化往往會有舊形式與新形式長時間共存的情形，形成新舊形式變異。如上述“南”“蠶”分別有nø⁶/ne⁶、zø⁶/ze⁶的變異。這種語音的替換變化大概從上世紀二十年代開始一直延續到現在，而變異始終存在著，即使是個體，也有變異。但是由語言內部自身語音條件引起的音變，則不會產生這種變異，“內”“站”“愛”等字只有一讀，沒有其他異讀。

	半	暖	酸	看	安	南	蠶	敢	庵
Edkins	ẽ	ø̃	ø̃	ø̃	ø̃	ẽ	ẽ	ẽ	ẽ
高本漢	e	ø	ø	ø	ø	e	e	e	e
趙元任(舊)	e	ø	ø	ø	ø	e	ø	e	e
趙元任(新)	ø	ø	ø	ø	ø	ø	ø	ø	ø

(三) 精組、知照系合口灰泰祭支脂字韻母的演變

精組、知照系合口灰泰祭支脂字韻母在1853年Edkins的書裡記為ûe[ʷe]，如“罪最脆綴稅歲隨吹雖追”這些字的韻母讀音都是ûe[ʷe]。在趙元任1928年的《現代吳語的研究》中，嘉興方言裡也是讀ʷe，說明1853年左右，上海縣城裡的話是接近嘉興方言的（整個松江府，包括上海縣，於元至元十四年從兩浙西路嘉興府分出）。到了上世紀初Edkins所記的ûe[ʷe]韻字（“罪最”等

字)，韻母都變為 \emptyset 或 α 。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裡，上海話“罪最”等字韻母都是 α ，趙元任《現代吳語的研究》一書裡則是 \emptyset 。這一時期，上述“罪最”等字的讀音，跟蟹開一哈（精組）字韻母的讀音是截然不同的。見表6：

表6

	Edkins 1853年	高本漢1915~1926年	趙元任1928年
“罪最”等字	追 ts^4le^1 罪 dz^4le^4	追 $tsce$ 罪 $dz\alpha$	追 $ts\emptyset^1$ 罪 $z\emptyset^6$
蟹開一哈（精組）	災 tse^1 在 dze^4	災 tse 在 dze	災 tse^1 在 ZE^6

趙元任1928年《現代吳語的研究》記錄的上海市區話山合三仙（知照組）也讀 \emptyset ，這樣，山合三仙（知照系）韻母跟上述“罪最”等字的韻母相同，都讀 \emptyset ，它們跟蟹開一哈（精組）字韻母 e 不同。如：

山合三仙（知照系）		“罪最”等字		蟹開一哈（精組）
專	=	追 $ts\emptyset^1$	≠	災 tse^1
篆	=	罪 $z\emptyset^6$	≠	在 ZE^6

大概到了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罪最”等字韻母開始有 e 的異讀了。許寶華、湯珍珠上世紀六十年代寫的《上海方言的內部差異》已記錄“罪最”等字韻母有 \emptyset/e 互讀現象。聯繫附近方言以及移民情況，我們認為“罪最”等字韻母讀 e 是蘇州話的滲透結果，韻母讀音的分類明顯跟蘇州話一致。原來同音的，變為不同音；原來不同音的，則變為同音。

	山合三仙（知照系）	“罪最”等字	蟹開一哈（精組）
	篆	罪	在
1928年上海市區話	$z\emptyset^6$	= $z\emptyset^6$	≠ ZE^6
1928年及今蘇州話	$z\emptyset^6$	= ZE^6	≠ ZE^6
1950年後上海市區話	$z\emptyset^6$	= $z\emptyset^6/ZE^6$	ZE^6

由語言接觸所引起的替換不受語音條件的制約，哪些字可以讀 e ，不受上海市區話共時語音條件的制約，而是根據滲透語言（蘇州話）的分類而定。“罪最”類字韻母有 \emptyset/e 異讀，原來跟這類字同韻母的山合三仙（知照系）字的韻母則沒有 \emptyset/e 異讀，只有 \emptyset 一讀，因為滲透語言蘇州話也是讀 \emptyset 。

（四）從（邪）、澄、床母的演變

從（邪）、澄、床母從擦音/塞擦音到擦音再到塞擦音的替換過程。趙元任在《現代吳語的研究》一書上說：

“j”系裡所以不一定加“dj”，是因為古音的床禪跟今音的“dj”，“zh”都是一筆糊塗賬，能分辨的如常熟、常州、寧波等地，它們辨類的法子，又是一處一個樣子，所以只並為一個“zh”類。同樣，從邪母也一律用“z”代表，不另加“dz”。^②

1853年Edkins 的上海縣城話裡尚有dz聲母，主要對應於古從母、澄母、床母，個別的邪母和禪母也有讀dz聲母的，不過上述各母也有讀擦音z的。Edkins 指出：

The initials z and dz correspond, though somewhat irregularly, to the tabular initials z, zh, and j, dz, dj.....

The d is often dropped, both in reading and in the conversational form.....

The d is in some words retained in reading, when dropped in the colloquial form.

他舉例說：“‘豺狼虎豹’中的‘豺’口語說zá，文讀是dzé；‘稻柴’中的‘柴’是口語，說zá，在‘柴門’裡文讀，讀dzé；‘造完’中的‘造’口語是zau，文讀是dzau。”^③

相同的字在不同的地方有dz/z兩種不同的記錄：“城”dzung（第29頁）、zung（第191頁）；“辰”（日月星辰）dzun（第39頁）、（辰光）zun（第200頁）；“在”（現在）dze（第128頁）、（實在）zé（第39頁）。

這種塞擦音/擦音的交替其實是反映兩種語音層次的競爭，讀塞擦音dz的是文讀層，讀擦音z的是吳語本地的白讀層。這種文讀層是以杭州半官話為中心，逐漸向四周吳語擴散開去^④，文讀層滲透的力量在各地不一，從而形成趙元任所說的吳語從邪澄床禪母讀擦音、塞擦音“一筆糊塗賬”、“一處一個樣子”。

隨著杭州話勢力的逐漸削弱，上海話裡從邪澄床禪母讀塞擦音dz的文讀音慢慢退出歷史舞臺，1915~1926年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記的是漢字讀音，而且最好能跟《切韻》的音類對應整齊。所以在書後《方言字彙》的記音裡上海話從邪澄床禪母某些字讀濁塞擦音，仍保留dz聲母。不過1900年Davis和Silsby的*Shanghai Vernacular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Shanghai: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一書裡已經說dz在大多數上海人的口裡讀成z母。1928年趙元任《現代吳語的研究》裡已經完全沒有dz聲母，換句話說，上海話dz作為文讀層已經消失。表7排列1853年Edkins的記音（原文拉丁字母記音）、高本漢1915~1926年的記音（高氏），以及趙元任1928年的舊派記音（趙氏記音根據趙氏原書第一章吳語聲母和第二章吳語韻母中的上海話記音組合而成，聲調省去）。

表7

	茶	隨	尋	全	剩	常	就	序	直	逐
Edkins	dzó	dz/zúe	dz/zing	dzién	dzung	dzáng	dzieu	dz/zy	dzuh	dzóh
高氏	dzo	dzœ	ziŋ	dzie	dzəŋ	dzaŋ	ziə	dzy	dzəʔ	dzoʔ
趙氏	zo	zø	ziŋ	zi	zəŋ	zã	ziγ	zy	zəʔ	zoʔ

比較Edkins和高本漢的記述，可以看出高氏正表裡只記一個讀音，而且往往是讀書音，比如，“隨”在Edkins記音裡有塞擦音、擦音異讀，“序”Edkins記音裡也有塞擦音、擦音異讀，高氏統統取塞擦音文讀，“尋”和“就”大概在高氏年代只有擦音一讀。到了1928年趙元任舊派，dz統統變為濁擦音z了，上海城裡話的聲母系統裡也就沒有dz這套濁塞擦音了。這一格局一直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1960年出版的《江蘇省和上海市方言概況》市中心多數派尖團音合併，細音前的z變為舌面擦音ʒ。七十年代開始，原來的濁擦音ʒ受普通話的影響，又開始向新的濁塞擦音dz變化，條件是原來是濁擦音ʒ的字，後接細音（[i, y]），在普通話裡又是塞擦音t_ʃ、t_ʃ^h的。如：齊前錢zi⁶/dzi⁶；全泉zi⁶/dzyø⁶；就zi⁶/dzi⁶；絕捷ziI⁸/dziI⁸。從塞擦音dz到擦音z/z是杭州半官話影響力消亡的過程，從擦音ʒ再到塞擦音dz則是普通話滲透力逐漸增強的過程。

（五）中性是非/反復問句的層次

中性是非/反復問句在市中心方言區有多種類型，如普通話“你是不是學生？”在市中心方言區有以下五種形式：1. “VP + VA⁸?”（儂是學生子VA⁸?）；2. “V + Neg. + VP?”（儂是

勿是學生子?) ; 3. “V + Neg. + VP + VA?⁸? ” (儂是勿是學生子VA?⁸?) ; 4. “阿+ VP? ” (儂阿是學生子?) ; 5. “阿+ VP + VA?⁸? ” (儂阿是學生子VA?⁸?) 。在老派和多數派口裡, 都可以說上述五種中性是非/反復問句。其中第一種用的最為普遍。第四、五兩種有一定的限制, 通常可用“啊”中性是非/反復問句(第四、第五種)的一般限於最為常用的動詞、形容詞, 如“是、有、會得、好”等。從歷史來源上講, 第一種類型VP+ VA?⁸是本地固有形式, 整個松江方言區這種形式也最為普遍。第二種類型則是杭州半官話的滲透形式。兩宋之交, 大批中原官宦及家族、百姓為了躲避戰事隨朝廷來到臨安(杭州), 臨安城的人口達120多萬, 其中中原地區移民人數遠遠超過當地人口。杭州作為南宋的首都長達150多年, 作為當時全國政治、文化、經濟的中心, 對周邊地區乃至全國具有輻射影響作用。官話色彩濃重的杭州話對周邊地區的方言也自然有強力的滲透作用。今杭州話中性是非/反復問句只有一種形式, 即V + Neg. + VP? 。杭州話滲透層V + Neg. + VP? 進入上海話以後, 必定引起本土層的“反抗”, 在競爭中互相妥協, 於是產生了第三種形式V + Neg. + VP + VA?⁸?, 本土層與滲透層疊床架屋。這在杭州話裡是沒有的, 是杭州話滲透層進入上海話後的改造。以上三種形式在十九世紀中葉到十九世紀末傳教士寫的上海話聖經或上海話記錄裡都能找到。進入二十世紀, 中性是非/反復問句新的形式又出現了, 第四種形式“阿+ VP? ”最早出現於無名氏1908年的《土語指南》。如: 阿+ VP? : “江老爺, 阿是伊要造房子?”^⑤ “伊個人, 阿有啥本事?”^⑥顯然這是蘇州話的滲透層。明清兩代一直到上海開埠以後很長的一段時期裡, 蘇州的地位遠高於上海, 蘇州話也是整個江南地區的權威方言, 用蘇州方言創作的文學作品在江南一帶盛行。如松江人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就是用蘇州話寫上海妓女的故事。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 蘇州評彈在上海開始流行。上海開埠以後, 蘇州話對上海話的滲透是通過兩種途徑傳播的, 一是文學作品、評彈藝術帶來的書面文讀, 二是蘇州一帶的移民帶來的口語。這一現象一直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 上海地位超越蘇州後, 蘇州話對上海話的影響力才逐漸減弱。趙元任1928年調查上海話也曾指出當時上海話有蘇州音、浦東音相互指責的情形, 可以看出蘇州話開始對上海話產生影響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 這和傳教士的記錄也是吻合的。蘇州話滲透層進入上海話以後也引起新舊形式的競爭, 產生本土層與蘇州話滲透疊床架屋的形式。這就是第五種形式“阿 + VP + VA?⁸? ”。1916年Gilbert McIntosh的*Useful Phrase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一書裡開始出現這樣的句子: “拉火車裡阿有得吃否?” (阿 + VP + VA?⁸?) 在1934年Albert Bourgeois的*Leçons Sur le Dialect de Changhai*裡也有相同的形式: “阿是交關要緊個否?”^⑦隨著上海地位的快速提升, 到了上世紀四五十年代, 蘇州話在上海的勢力逐漸式微, 而上海話的權威性則大大提高, 於是用第四、第五種形式日漸萎縮, 能在“阿 + VP”結構中用的動詞形容詞只限於最常用的, 如“阿是、阿有、阿要、阿好、阿會得、阿可以”等。這樣, 雖然上海市中心方言中性是非/反復問句有五種形式, 但是其他幾種都有較多的限制性, 最常用的形式還是第一種本土形式。權威的更迭引起語言滲透方向的不同可見一斑。

五、結語

上海市中心方言是在原松江方言區發展而來的。如果1843年上海城沒有被闢為通商口岸、至今仍是舊松江府所轄上海縣縣城的話, 它的語言面貌應該跟今市中心區周圍的松江方言區上海小區接近, 也應有大致相同的發展速度和方向。由於170年來獨特的政治、經濟、文化、移民等因素, 造成了市中心方言跟周圍松江方言區方言的發展不平衡, 市中心方言演變的速度要快得多。

這是一種非常典型的方言地層學現象，即中心城鎮的方言由於非語言因素（如政治、經濟、文化、移民等），語言演變迅速，成為語言發展的超前層，環中心城鎮邊緣地區的語言演變向中心城鎮的語言靠近，但演變的速度較為緩慢，為語言發展的滯後層。這樣，本屬一個地層平面的語言，出現了層次差異。以具有代表性的聲調系統為例，如果把市中心方言區五個聲調系統為第一層的話，那麼市中心方言區老派的六個聲調系統及浦東的洋涇鎮話為第二層次，市中心周圍的梅隴、真如、江灣聲調系統為第三層。梅隴、江灣、真如的老派方言屬於松江方言區上海小區，都有七個聲調（見表2），調類和調值都非常接近1853年Edkins的描寫，洋涇的老派是六個聲調，調類及調值跟上海市中心近於消失的老派相同。梅隴、江灣、真如的新派聲調跟洋涇老派的相同，都是六類，調值也一樣。洋涇的新派的聲調則跟市中心方言多數派一致，都是五類，調值也一致。

市中心方言的快速演變跟移民方言的滲透影響是分不開的。縱觀170年的歷史，市中心方言最重要受兩波勢力的影響，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是受地區權威話蘇州話的影響最深；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後則是受普通話的影響最為深刻。

①陳忠敏：《上海市區話舒聲陽調類合併的原因》，北京：《方言》，2007年第4期。

②趙元任：《現代吳語的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年，第39~40頁。

③Edkins, Joseph, *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First edition 1853, Second edition 1868, p. 47.

④鄭張尚芳：《吳語中官話層次分析的方言史價值》，丁邦新主編：《歷史層次與方言研究》，上

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王軼之：《從邪母在北吳中的演變初探》，《中國語言學集刊》，第五卷第一輯專刊《吳語的歷史研究，紀念李方桂先生》，香港：中國語言學研究學會、香港科技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2011年。

⑤⑥無名氏：《土語指南》，上海：土山灣慈母堂，1908年，第27、31頁。

⑥Albert Bourgeois, *Leçons Sur le Dialect de Changhai*, Imprimerie de T'ou-sè-wè, 1934, p. 165.

參考文獻

[1]陳忠敏：《上海地區方言分區及其歷史人文背景》，上海：《復旦學報》，1992年第4期。

[2]陳忠敏：《上海市區話語音一百多年來的演變》，《中國東南方言比較研究叢書》，第一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

[3]陳忠敏：《上海地區方言的分片》，北京：《方言》，1993年第1期

[4]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1915~1926），趙元任等譯，長沙：商務印書館，1940年。

[5]江蘇省和上海市方言調查指導組：《江蘇省和上海市方言概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60年。

[6]錢乃榮：《當代吳語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

[7]許寶華、湯珍珠：《上海方音的內部差異》，上海：《復旦學報》，1962年第1期。

[8]許寶華、湯珍珠主編：《上海市區方言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

作者簡介：陳忠敏，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 200433

[責任編輯 陳志雄]